

走出“初民社会”的两条路径： 社区研究的文化论与马林诺夫斯基 的文化接触学说

社会
2026 · 4
CJS
第 46 卷

田 耕

摘 要：如果说走出“初民社会”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种跨国学术共识，那么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如何从该共识中走出一条致力于重建文化国族的独特道路？本文通过对比马林诺夫斯基和社区研究的文化论这两种走出初民社会的方案，指出前者打造了一种深具现在史特征的“文化接触”概念，将“接触”视为自成一体的文化生成机制，这一观念最终和悬置国家、淡化文明与野蛮两分的国际主义结合在一起；反观后者，“一战”后，中国知识分子很早就开始反思和批评国际主义，这在刺激社区研究走出初民社会的同时，也以边政和边疆为枢纽，开拓了重返文化国族的社会学道路。社区与边政的呼应，推动社区研究者展开对于文化边界的分析，并进一步将民族建设视为社区的自然延伸。在方法层面，本文并未局限于学说的接触和接受史，而是以感通历史情势与理论心性的方式来呈现学说之间的关系。这种做法也是在世界史视域下反思中国现代学术的一种努力。

关键词：文化接触 国际主义 社区研究 文化边界

DOI:10.15992/j.cnki.31-1123/c.2026.04.001

Two Ways Out of “Primitive Society”: The Culture The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Study and Malinowski's Theory of Culture Contact

TIAN Geng

Abstract :Given the one of the interwar intellectual consensuses that anthropology could go beyond the “primitive society”, how did the community studies of the Yenching School carry on the exodus of the “primitive society” into an intellectual

* 作者：田 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Author :TIAN G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mail :gengtian@pku.edu.cn

本文最初的版本曾在北京大学区域和国别研究院的午间沙龙上讨论过，感谢研究院同仁的批评和指正。文责自负。

agenda of rebuilding the cultural natio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two ways out of the “primitive society” led by Bronislaw Malinowski and the cultural the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Study. Malinowski raised a deeply presentist idea of culture contact which theorized contact into a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culture by its own. Malinowski’s way eventually joined an internationalist regime which downplayed the role of sovereign state and blurred the boundary between civility and primitivity. In contrary, the critiques of internationalism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fter the WWI provoked the community study to direct the exodus of the primitive society into renewed studies of frontiers, a powerful sociological path towards nation building in the cultural sense.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ommunity and frontier politics generated a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boundary and therefore extended community into the cultural constitution of nation. Methodologically, this paper tries to depart from the two major frameworks of writing disciplinary history: reception and contact, and tries to rewrite the exchanges between intellectual thoughts from a sympathist perspective, i.e. the common sensibility of the intellectuals on world changes and theoretical minds. This perspective might help present the cosmopolitan nature of the Chinese academic histories.

Keywords : culture contact, internationalism, community study, cultural boundary

一、引言

过去 20 年左右的学科史研究,印证了作为中国社区研究的思想奠基者之一吴文藻 (2010i :5) 在《社会学丛刊》发刊词中的基本设想:社区研究一方面要提供对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经验描述与分析,另一方面也要提供基础性的理论,因为“社会学便是社区的比较研究”,而社区则是比较社会学“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中的一环。

作为经验分析,社区研究在现代中国社会学中的历史地位已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围绕社区研究与社会调查的关系(李章鹏,2008;吕文浩,2008)、社区调查中人文区位学的内涵(侯俊丹,2018;王铭铭,2021)以及由社区研究所发展出的边疆民族调查与研究路径(杨清媚,2010;王铭铭,2005;田耕,2019)等议题,研究者们已经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

在社区研究的思想内涵方面,吴文藻 (2010i :6) 对功能论的重视众

所周知,他认为“比较社会学乃是实地应用功能研究法”。他将功能分析与区位分析进行比较,认为前者更善于描述变动中的文化整体(吴文藻,2010f)。本文将这种观点称为社区研究的文化论。下文将表明,社区研究的文化论将社区从占据特定时空的实体拓展为一种文化概念,与旨在建立独立文化学与文化分析的同时代学者如黄文山和孙本文¹等人的立足点有所不同。

在为社区研究的文化论赋予理论意义的过程中,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事实是:吴文藻(2010b,2010d,2010f,2010g)一直在功能论的西学脉络以及与之相关的世界历史语境中展开论述,他不仅积极引介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功能论著述,而且花费了相当的力气将分属于不同国别的研究传统汇聚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功能论学说。这些努力尤其体现在吴文藻对功能论的代表学者之一马林诺夫斯基的评论上。

1936年,吴文藻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出游欧美,并在英国与马林诺夫斯基相识。在巴黎,吴文藻(1985)看到了莫斯(Marcel Mauss)那本还处于手稿状态的《民族学手册》的部分内容。除了组织自己的学生将马林诺夫斯基当年尚未发表的《文化表格》初稿译为中文之外,他还写了篇幅相当长的《论文化表格》一文对其加以评论。²在文章中,吴文藻(2010h)首先将《文化表格》放在欧洲民族志调查格(ethnographic questionnaire)的写作传统当中,认为马林诺斯基不仅吸收了那部著名的英国人类学著作《人类学调查与问询》(*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而且与年长于他的两位法国民族学家莫斯和马林(Louis Marin)心有灵犀。

马林是第三共和国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法国民族学的旗手。赫尔曼·勒博维奇(Lebovics,1992)认为,以黎伯勒(F. Le Play)门徒自居的马林对民族学的首要兴趣就是发展民族志调查格。³1897年到1925年,马林陆续将自己倡导的民族志调查格扩展到上百页,并将其分为物质生活(Vie Matérielle)、精神生活(Vie Mentale)和社会生活(Vie Sociale)三大部分。这种三分法对后世研究习俗的学者有相当的影响(刘增贵,2002)。在吴文藻看来,马林的调查格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

1. 两人的观点可参见:陆远,2019;肖文明,2024。

2. 该文于1938年首刊于《社会学界》第10卷单行本,题为《文化表格说明》。

3. 不过,勒博维奇将民族志调查格视为一般社会调查(survey)运用于民族研究的结果,进而将之与勒普莱推动的“社会调查”联系在一起,同吴文藻的看法有很大不同。

表格共享了对文化的三分法定义。他还在《论文化表格》第一节的末尾用篇幅很长的脚注说明,从博亚士 (Franz Boas) 到阿尔弗雷德·韦伯 (Alfred Weber) 再到梁漱溟,都在使用精神—社会—物质的三分法来定义文化。吴文藻 (2010h) 由此将文化表格视为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文化科学的一个概念性总结,并进一步从中推衍出了写文化的手法。

由此可知,吴文藻对功能论的重视并非完全出于介绍的需要,而是包含着他的学术再造计划。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是否需要花费如此细密的努力去进行对世界学术潮流的翻译和介绍?他重组西学脉络的种种努力背后是否有更深的用意?

本文认为,吴文藻通过类比、关联和阐发,将马林诺夫斯基源于西方民族志调查格传统的文章转化为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点——一种走出“初民社会” (primitive society) 的文化学说。对于人类学应走出初民社会并转向研究者自身所在的文化体系的说法,中国读者并不陌生。20 世纪 30 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在为其指导的学生著作作序时,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这个说法。例如,他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指出,该书的一个突出贡献是使人类学进入对“先进文化”的研究,并表明,若想了解中国文明,就要阅读中国人的生活,理解中国人在现实中如何思考,“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 (马林诺夫斯基,2010 :6)。在与费孝通的著作几乎同时出版的肯雅塔 (Jomo Kenyatta) 的《面朝肯尼亚山:吉库尤的部落生活》 (*Facing Mount Kenya :The Tribal Life Of The Gikuyu*) 一书的前言中,马林诺夫斯基开门见山地说:“‘人类学始于家乡’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共识”“我们应该首先了解自己” (Kenyatta, 1982 :vii)。而在马林诺夫斯基写作这两个序言之前,与费孝通同样就读于燕京大学的李安宅,已经在访学耶鲁大学时,因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博德梅克而确立了人类学家应“直接参与本民族改造” (Powdermaker, 1967 :13) 的观点。作为马林诺夫斯基最早的中译者之一,李安宅 (1935) 坚定地以文化适应为手段,找到了乡村重建 (rural reconstruction) 的方案,并视之为中国民族重生 (national rebirth) 的关键。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下文简称为间战期) 的思想世界中,社区研究的文化论的上述发展既符合时代共性,又具有独特意义。本文将比较马林诺夫斯基与中国社区研究在走出“初民社会”路径上的异同,以此重返间战期的思想变迁,进而揭示社区研究在其中的贡献。

本文将表明，走出初民社会的理念源于文中所涉学者的世界史眼光。这里所谓的世界史，其核心是“一战”之后所奠定的帝国国际主义秩序(imperial internationalism) (Pagden, 1995 ;Pederson, 2006)。在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与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功能学说的兴起，均可以在这一秩序中找到源头。面对“一战”后兴起的国际主义浪潮，吴文藻和马林诺夫斯基都有一种对不以传统社会为基础的传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燕京学派与马林诺夫斯基学说的呼应正奠基于此。

在共同的兴趣之外，吴文藻在评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表格时表现出了更深的理论转向，他更关注社区研究将以何种方式进入文化国族或更大的文化机体的建设。若从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在抗战之后的发展来看，这一点更加明显。相比之下，这种以社区研究来理解和重建国族的思路，是“二战”中离开英国、继而在美国早逝的马林诺夫斯基所未曾预见的。如果我们把马林诺夫斯基为《江村经济》写作的前言放在燕京学派在战时边疆的学术实践之中，问题或许会变成：如果走出初民社会是间战期的一种跨国学术共识，那么燕京学派如何在这一共识当中走出一条致力于重建文化国族的社会学道路？如果说走出初民社会到新的国族前景这一转变并非马林诺夫斯基的愿景，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在共识中所展现的个性？这些正是本文将以比较学术史的方式来讨论的核心问题。

就学科史写作的方法而言，此前的学术史研究多从学说的接受和改造的角度来论述社区研究的文化论的形成，这实质上是写作一种学术的接触和旅行(萨义德, 2023)。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人文区位学和功能主义都因有实质性的学术中介，如留学生和外国学者在华举办的学术活动以及中外学者的师承关系等，而与中国学术界有切实的互动。因此，在论及二者在中国社区研究传统中的意义时，研究者大多从民国时期的学术接触出发来进行写作。本文则试图表明，除了直接的学术接触，对世界局势乃至人文前景的感通也是学术和文明互动的引擎，看似没有以学说为媒介的相互联系或许正是学术史流变的另一个层面(田耕, 2020)。本文试图重现吴文藻等早期中国社会学家自觉转化(而非被动接受)功能主义人类学背后的政治和思想脉动，并指出，正是这种文化和政治的自觉心改造了学说走向，并将间战期的世界历史与社会人类学实质性地联系在一起。

下文将分三部分展开:第二节将表明,“一战”后的世界秩序和文明图示中,包含着压缩“初民”与文明世界距离的理念和以礼物与互惠为代表的人类学概念,显露出一种将不同文化和民族放入新的国际主义轨道的冲动。这种国际主义和走出“初民社会”的理念促使人类学更深地走进本文化的社区。第三节将梳理马林诺夫斯基所打造的走出“初民社会”之路。无论是以传统还是以习惯为名,间接统治均无法也无需走出“初民社会”,而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接触学说则对间战期英属非洲那种保持殖民和本土文化并立的二元统治提出了质疑和反对。这是马林诺斯基对走出“初民社会”的国际主义面向的深化。诚然,马林诺夫斯基的批判以文化动态论的形式刺激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学者,但他的道路实质上并未区分国家主义和民族建设。第四节将指出,与马林诺夫斯基的道路相比,社区研究的文化论以边疆社区和边政来重塑文化国族的肌理,从文化的动态论走向了明确的国族重建道路。在这样的道路中,一种充实的文化论为构造文化自觉心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一战”后的世界和走出“初民社会”的共识

1918 年 1 月 8 日,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国会演说中发表“十四点主张”(Fourteen Points),代表着间战期帝国式国际主义的到来。所谓帝国式国际主义,即一方面强调扩大“国联”的成员国资格(不止于欧美国家)和所谓“自决”原则;另一方面则与帝国的存在和继续扩张以及种族不平等并行不悖(盖塔彻,2025)。这既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各个成员都要有文化自觉,又意味着只有帝国才能辅导各国理性看待自身的传统并形成自治和自觉的能力。这种矛盾性的存在构成了“一战”后世界秩序的关键。“一战”的结束并非标志着国际主义的开始,而是标志着各种不同的国际主义之间竞争的开始(Moyn,2010; Wheatley,2013; 梅佐尔,2015)。殖民地因融入各种国际组织与成为国际法成员,而成为宗主国政治与思想论证的焦点(Gorman,2012; 布尔、沃森,2014; 盖塔彻,2025),所谓的“不平等融入”(unequal inclusion)过程在 20 世纪初期变得愈发明显。

帝国式国际主义不仅是政治关系的一种表现,还很深地体现在间战期的文明观念上。“一战”后期,出现了一种以所谓的“团结主义”

(solidarist) 来重新认识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的看法 (Mallard, 2019)。与“一战”后以文明托管替代没有退场的帝国相呼应,文明和野蛮的对立以及古代与现今的差别也遭到了质疑,探寻新的文明观念成为发展程度不同的社会之间的综合问题。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作为同代人的马林诺夫斯基和莫斯对“礼物”与“互惠”的挖掘正体现了这一点。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与“互惠”以及莫斯 (2002) 通过比较而建立的“礼物”,以不同的方式打破了“古式社会”(archaic society)与“初民社会”之间的区分,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将习俗从传统社会中扩展了出来。从“库拉”(kula ring)到“礼物”,马林诺夫斯基和莫斯试图表明,“礼物的流动”不仅是习俗,而且是秩序——人们始终生活在“礼物”的经济下面。打破“礼物”和市场的初民与文明属性,是间战期学者们的某种集体心态,也是他们对“一战”后国际主义气氛上升的一种回应。⁴在借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莫斯笔下,一个充满当代感的社会以“古式社会”——即“逆时间”(anachronic society)——的形态呈现了出来 (Coleman, 2021: 82-83)。“礼物”和“互惠”像人类学思想的谜咒一样,冻结了时间,使得大量的古今社会形态之间可以相互印证。

简言之,“一战”后的世界秩序和文化图示中,包含着压缩初民和文明世界的距离、将不同文化和民族放入一个新的国际主义的冲动。这一主题促使人类学从执着于描述文明的原初形态中走出,开始重视人类学参与现代社会的方式。因此,走出初民社会、将民族志的凝视对准研究者自身的文化,并不是一种基于多元文化的想象,而是上述国际主义的一种激进流露。

在对从“一战”到“五四运动”这一脉络的思想研究当中,外交和国际法的线索占据着主导地位,其核心是对威尔逊主义和国联 (Union of

4. 金兹伯格 (2014) 以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和通信为基础,指出了马氏对史蒂文森小说中“瓶魔”隐喻的借用,并重新解释了流动在“库拉”中的名望与财富之间的矛盾。其中,谁保有“库拉”是个关键的条件 (梁永佳, 2020)。“礼物”作为间战期现代国家关系的反映,是一种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建构,而不是一般所谓“经济人”理性的反面。这一观点已得到很多的思想史论证 (Mallard, 2019)。回到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与马林诺夫斯基一样从中欧—哈布斯堡的德语学术世界中走出的同时代人波兰尼 (Karl Polanyi),正是上述思潮的典型。波兰尼比马林诺夫斯基小两岁,他的《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在互惠性的问题上直接将马林诺夫斯基放入了经济史上“不分古今”的传统当中 (Humphreys, 1969; Hann, 1992)。

Nations) 之期待的破灭。⁵但事实上,学者们对于间战期国际秩序的观察并未止于上述从期待到破灭的过程,这些观察还令中国学者在文化心态上产生了新的变化。1926年,尚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吴文藻就已把建设一个团体生活丰富的国族视为实现“国际主义”的关键。⁶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和“二战”的临近,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更是自觉地将中国的发展道路置于对“一战”后国际局势的观察和判断当中。吴文藻(2010d)很留心19世纪末以后人类学与殖民行政的结合。在他看来,至20世纪中叶,“英美的委任统治观念,以及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将皆成为促进边疆文化理解的知识系统(吴文藻,2010j:576)。其中,英、美的“委任统治”(mandates system)观念尤其值得注意,它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引领着国际主义的潮流,而且与人类学的发展密切贴合,这意味着殖民帝国将以“科学”而不是“经验”的知识形态来强化治理的基础。⁷在推动“委任统治”成为殖民帝国一部分的力量当中,英国人类学尤其突出,其在改造殖民政策和治理方面的效果使英帝国取得了其他欧美国家所不能及的殖民统治成就(吴文藻,2010g)。⁸

在同代学者中,吴文藻的上述判断并不鲜见。⁹例如,比吴文藻略小

5. 对比国际法学者周鲠生(1922)的《万国联盟与委托治理》和蒋廷黻(1933)的《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与国际》即可明了。关于从“一战”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反应,除了周策纵(2019)的经典著作,还可参见:Schmidt,1998;马建标,2018。

6. “吾且主张无数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民族国家,以其可为实现国际主义最稳健之途径。”(吴文藻,2010a:419)

7. “委任统治”系国际联盟根据《国联盟约》(*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1920)第二十二条设立的制度。该条规定,国联设立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Permanent Mandate Commissions,简称PMC),将被依据“走向独立和自治”的时间长短分为三类的土地,托付给委任国进行管理。《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认为,这一制度是“神圣的文明托管”(sacred trust of civilization)(Brown and Louis,1999)。其中,热带非洲是1919年划分的委任统治地区的第二类,也是该类别中的核心地区。殖民地官员和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学者们在间战期对这一地区有着相当的关注。

8. 荷兰曾于1851年在莱登大学创办了民族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所,但“一战”之后,荷兰所谓的“道义政策”(ethical policy)被视为“科学殖民论”的代表,几乎与下文将要讨论的英帝国的“双轨托管”齐名(Held,1953;Kohl,2013;Tuori,2014)。

9. 与吴文藻同时期的中国学者对于“委任统治”的思考,可参见人类学家刘咸(1935)的《国防建设与边疆民族》一文以及参与创立中国民族学会的民族学家黄文山(1943)的相关见解。

的人类学家马长寿(2003)于1947年在《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一文中敏锐指出:人类学被视为研究初民社会的学科,而与研究文明化国家之组织的政治学、社会学截然分开,其根源在于凡尔赛体系后来对文明与文化的二元划分。他因此认为,将“初民社会”修正为“俗民社会”(folkway society),正是西方人类学内部针对“初民”和“文明”的不当区分所进行的调整。20世纪40年代初,吴文藻的学生林耀华同样十分关注人类学如何介入当代社会的行政实践。他呼吁将人类学与狭义的初民研究区分开,并注重其运用于当代社会行政的一面。林耀华从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总结了英美人类学的行政参与方式。在对外方面,他认为英属非洲的殖民行政和美国的印第安事务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堪称代表。在对内方面,则列举了更为丰富的例子,包括美国农业部聘请以威尔逊(Milburn L. Wilson)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指导农村复兴运动,梅奥(Elton Mayo)等人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用于工业心理监测的尝试以及理查森(Frederick L. W. Richardson)以五十户人家为对象开展的宾州手工业复兴计划等(林耀华,2023b)。¹⁰

这样看来,以燕京学派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社会学对民族志应走出初民社会、转向理解自身的强调,可以说是间战期学术思想史的一部分。其中,人类学对现代世界和现代国家的参与是关键环节。毋庸置疑,上述中国学者对“一战”后人类学角色的敏感,正是社区研究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那么,社区研究的文化论,是否只是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说及其背后的国际主义的一种呼应呢?

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背景是,中国学界自“一战”爆发时起,便已对所谓国际主义问题予以密切的关注和讨论。梁启超(2014)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知识界对“一战”的一种典型反应,即如果现代国家性(statehood)必然导向更具破坏力甚至更为野蛮的国家竞争,那么它便未必是国族持久繁茂的充分条件。杨度(1986)曾于清末(1907年)提出如何才能成就一个处于野蛮世界的文明国族的问题,这一问题在间战期近乎“思想战”的格局下重新引发了关注。此时,包括“五四”文化运动在内的思想变动对国际主义有了特别的吸收,而国际主义能否带来中华民族的发展并助其进一步融入世界,也引发了

10. 1941年,即林耀华取得学位离开美国的那一年,应用人类学会在其攻读博士的哈佛大学正式成立。

相当多的讨论。国际法学者周鲠生(1930)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一文中,即以和平作为民族与世界所共同秉持的文明理念;李大钊(2014)则于1919年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之中更直白地说明,国际主义之间的矛盾未必逊于国家主义,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恰恰构成了妨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民众成为国际社会联合力量的最大阻力。

因此,走出初民社会的一个思想前提,正是以国际主义抑制初民社会与文明之间的距离。这种国际主义在间战期不仅深刻影响了国际秩序,在文化秩序中也同样重要,进而使人类学成为思考本文明的入手点。然而,这种国际主义的航程并不长,人类学走出初民社会并转向思考本文明的努力注定无法在这条行程中抵达终点。既如此,考察如何从走出“初民社会”的学术主题中衍生出一条反观中国社会的路径,或许是重新理解社区研究之学术意义的一个角度。

下文将首先回到走出初民社会这一主题的代表性人物——马林诺夫斯基,考察其在间战期的学术轨迹,以此呈现当时国际主义在文明观念上的具体体现。马氏的思想运动恰可展现出这一观念的活力和局限。随后,本文将重点分析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如何超越马林诺夫斯基的期待,从走出初民社会的学术主题中开辟出一条理解中国国族的新路。

三、文化接触和国际主义:以马林诺夫斯基的方式走出“初民社会”

(一)“直接民族志”中的现在史

前文将马林诺夫斯基与中国社区研究并置于“一战”后的思想背景中,视走出初民社会的民族志为二者共同的思想动机。其中,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接触”(cultural contact)视为打破初民和文明之别的有力的武器,并由此发展出其成名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1922年)中的想法。在该书末章,马林诺夫斯基(2017:673-674)将“库拉”视为一种“原始国际法”(primitive international law),因为库拉是“一种新型的部落间接触,一种新型的共同体间关系。……这不是一种间歇的或偶发的关系,而是一种有规律的、永久的关系。……我们首先面临的是一个明确的文化接触的问题”。这一概念后来亦成为他从太平洋田野转向非洲田野的入手点。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此前的民族志研究偏重于搜集孤立的习俗和

特别的信仰，然而这种知识形态远不足以形成对原住民自然生活的真正理解。与之相反，理解原住民的生活意味着理解他们当下的生活，即其被嵌入殖民体系后的生活。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930 :406）由此构想了一种新的知识形态，这种知识形态“能够摆脱人类学的浪漫想象力，远离机械时代的冲动，不再浪漫而闲散地栖居于古典学愚人们的乐园中”。这种新知识要求研究者从实在的现实生活出发考察初民社会，它所提供的是活的而非死的理解。

马林诺夫斯基（2017）对习俗的“源头”（origin）敬而远之，主张将习俗溯源与民族志描写严格区分。他试图冲破以溯源为基础的人类学知识局限，这一努力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已表露无遗。换言之，马林诺夫斯基的直接民族志中包含着将观察者同步的“现在史”（presentist history）。他坚持从这一高度感通性的立场出发来进行田野工作，“接触”也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现在史的核心。马林诺夫斯基对直接的、最小干扰的田野观察的信赖，正是对这种“当下”民族志的强调。

学术史的一个通行理解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革命在相当程度上以“直接田野”的形态呈现，其针对的是种种依赖地方性报告和间接观察、充斥着进化论色彩的摇椅人类学。然而，在伦敦政经学院所保留的马林诺夫斯基档案等更为充分的传记史料的基础上，新近的学术史研究已对这种民族志的革命性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Kuklick, 2011；Rosa and Vermeulen, 2022）。其中，一个关键的澄清在于：马林诺夫斯基在方法论上不仅认同，而且很自觉地运用了其英国人类学前辈，尤其是里弗思的成果（Kuklick, 2011）。

如果马林诺夫斯基对其学术前辈早已开启民族志革新工作一事有所知晓，那么直接田野工作的“科学观”就未必是针对那些“前科学”时代的传教士与旅行家们所从事的“间接田野”。若真如此，他所倡导的民族志田野究竟是针对什么而发呢？

（二）从“双轨”到“接触带”的文化分析：马林诺夫斯基的“实践人类学”

马林诺夫斯基思想上的真正对手，是那些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就代表着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官员。自 19 世纪下半叶起，这些官员就在政策和思想上代表着某种英帝国的正统（official mind），并逐步将科学统

治殖民地视为己任 (Pels, 2011)。¹¹ 巧合的是,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问世的同一年,“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 理念的代表人物之一卢嘉 (Friedrick Lugard),也出版了阐释这一统治形态理念的名著《赤道非洲的双轨统治》(*The Dual Mandate in Tropical Africa*)。卢嘉所代表的“间接统治”思想的核心正是强调殖民者有义务维系属于本土文化的传统社会。因此,“间接统治”无法也无需走出初民社会。这一思想深入英帝国的统治实践,并在非洲促成了将习俗和欧洲文明并轨而行的治理方案。由此可见,无论是以传统为名还是以习惯为名,“间接统治”都与走出初民社会的方案有着重要区别。本节将表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接触学说正是对这一正统思想的批判,并且这种批判以文化动态论的形态进入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区研究的视野。

卢嘉于 1922 年到 1936 年担任国联委任统治委员会 (Mandates Commission) 代表期间,确立了三个核心要素:本地权威或行政 (native authority or administration)、本土法庭 (native court) 以及本土财政 (native treasury)。这三者均建立在部落领袖制度的基础上,进而形成了以部落为基础的领地统治 (高晋元,1989 ;Mamdani,1996)。英帝国殖民地既重视托管统治 (trusteeship),同时又保留了人道裁量 (repugnancy test) 的办法——这要求法官一方面应维护和尊重部落习俗,另一方面又应保留对习俗进行审查和区分的能力 (Moore,1992 ;Hyam,2010),以确保习俗和人道性的统一。在卢嘉的理念中,有效隔绝殖民地和欧洲制度,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以及维持差异的重要性,才是最终通向文明秩序的必要阶段 (Perham,1956)。换言之,削弱被殖民者在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之间的身份转化 (Steinmetz,2008),才能更好地维护殖民地的习俗及其文化的完整性,乃至保持殖民地的道德生活 (Foks,2018)。以习俗为名的统治,在卢嘉这里发育成了借助习俗实现殖民的“双轨统治” (Lugard,1922 ;Mantena,2010)。习俗的延续,意味着应在殖民政治中审慎地保持本土文明和外来的欧洲文明之间的界限,使之互不逾越。

经过维多利亚时代“正统”史观的强化,殖民地统治虽然形成了上文所说的本地习俗和西来文化之间的“双轨”,但准绳仍是英帝国的行

11. 关于科学的殖民在此一时期的申说,可参见 Mair,1933。作为马林诺夫斯基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之一,迈尔于 1935 年获得了英国皇家人类学社颁发的沃尔克姆奖章,这一奖章正是为了表彰其在运用人类学知识解决殖民地问题方面的贡献。

政精神,其执行者是把习俗与正统史观结合的行政官员,他们对学院派的田野工作有所排斥 (Abrahams, 1991)。¹² 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曾深度参与殖民事务的里查兹 (Audery Richards) 曾指出,英国的殖民研究委员会 (Colonial Research Council) 在“二战”之前并没有真正资助过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甚至“以不支持著称” (Mills, 2005)。这是因为他们对殖民地的民族志想象不是一种有关殖民地的实地知识,而是对其母国文化资本的一种运用 (Bashkow, 1995; Steinmetz, 2007)。从宗主国文化精英的资本中形成描写殖民地的民族志手法,与从比较历史文明图示中推出传统社会的存在并予以强化,道理可谓异曲同工。

卢嘉提出的“双轨统治”的核心是一种致力于改善非洲本土的“发展观”,但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他始终没有为这一理念找到充分的落实手段。而此时,得益于英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¹³ 马林诺夫斯基得以将其实践人类学发展为“三段式”的文化论。在他看来,替代直接统治的应当是在原住民和欧洲制度之间形成一个中间地带,找到其自身的规律,而不只是一边宣扬西方的实定法和文明,一边单纯地认同保护习俗 (Malinowski, 1945)。马林诺夫斯基主张搁置对在地传统的溯源,同时期的一些英属非洲殖民官员也对此表示认同 (Matthews, 1937; Malinowski, 1945; Foks, 2018)。这个“三段式”的说法更明确地体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与间接统治主张之间的区别。可以说,是马林诺夫斯基将反对溯源的想法从大洋洲传到了英属非洲。

如果将马林诺夫斯基和卢嘉的对话视为“因俗而治”和“反对传统溯源”两种思路的碰撞,那么走出初民社会的构想则首先意味着对于将

12. 间接统治思想是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开启的“因俗而治” (rule by custom) 之说的演进 (Mantena, 2010)。后者是 20 世纪初学者和殖民地行政之间日益明朗的共识 (Cooper, 2004),深刻影响了 19 世纪晚期在英帝国殖民中发挥作用的官员。这些官员和他们的精神导师梅因一样,转向了将英帝国和古代帝国的政治成就进行对比的政治思路 (熊莹, 2011; 施华辉, 2022)。

13.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工党崛起激起了关于英国殖民地政策特别是东部非洲的争论。定居殖民地的扩张以及移民对统治权的不断要求,既使帝国统治中的同化越来越难,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深入殖民地的拓殖精英和宗主国政治中心之间的紧张 (Pederson, 2005; Ford, 2010)。1929 年 5 月,工党获胜组阁,马林诺斯基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同事、“费边社”的核心成员之一韦伯 (Sidney Webb) 随即出任殖民事务部秘书长,马林诺夫斯基由此得以不断地将对非洲文化接触的思考引为伦敦经济学院的讨论议题。他对英属非洲的访问和对英帝国非洲政治的批评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发展出来的。

刻意保持的双轨转变为“接触带”的文化分析。1929年,马林诺夫斯基在国际非洲研究所的官方刊物《非洲》(*Africa*)上先后发表了《实践的人类学》(*Practical Anthropology*)和《人类学理性化和行政》(*Rationaliz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Administration*)两篇文章。文中指出,只有实践的人类学才能找到一种欧洲移民和本地人之间的“调和”(compromise),这种调和意味着“不能置非洲人不顾,但也不能假手一些在幻想中令白人消失的非洲之友去帮助非洲人”(Malinowski, 1930 :319)。对于马林诺夫斯基来说,人类学独一无二的贡献应是研究文化接触之下的社会组织,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本来的文化组织。

如果脱离间接统治所提供的隔离,那些在间接统治中被有意保存的习俗就会进入“文化接触”的状态,问题是它们如何成为“接触”中的动力因子?在有关“文化接触”的学说中,分门别类地看,“接触”当中的文化要素(ingredient)都有各自的来源地,而“接触”本身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构成力量,能够将这些来源不同的要素整合成一个运行有方的社会。研究“文化接触”,其实就是研究“接触”这个独特的文化生成情景中的核心动力,而不是追溯各个要素从何而来,也不是描述这些渊源不同的要素如何混合在一起(mixture of elements), (Malinowski, 1945)。

在马林诺夫斯基的非洲观察当中,“文化接触”的核心动力首推欧洲殖民和非洲本地人之间的遭遇。这个遭遇可以是合作,但也完全可能是冲突(Malinowski, 1945)。只有把“接触”当作自成一体的文化生成起点,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上述冲击一回应对非洲政治改变的巨大影响。我们可以把“接触带”视作一个边界地带(frontier zone),在这个边界地带的两侧,有很多来自其外的文化要素,它们不见得属于欧洲或非洲,而这些要素如何组合成两种在接触中发生互动乃至对抗的力量,才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谓的文化变迁学说所要解决的问题。¹⁴因此,基于非洲观察的“实践的人类学”质疑“间接统治”那种有意维持传统部落社会与西方社会之分界的做法,并由此延续了马林诺夫斯基质疑“传统社会”的

14. 例如,以非洲劳工使用的日本自行车为例,马林诺夫斯基指出,这个物件背后的文化接触问题是:一方面,欧洲殖民者建立了新的道路和交通体系,骑自行车上班因此成为选择;另一方面,这也是非洲劳工被禁止乘坐巴士和火车所带来的后果(Malinowski, 1945)。只要看到这两点,便不难看出,使用自行车不只是文化借鉴、学习或物质传播,当然更不是—般意义上的殖民现代化。

理论意图 (Malinowski, 1929 ;Foks, 2018) 。

这个概念图示令在伦敦跟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的费孝通在晚年仍然记忆犹新。他在回忆留学生涯的时候特别引用了马氏对非洲文化的三段式解说。

即使仅从表面上看去，也能明白变动中的非洲文化不是一个完整一体的对象，而存在着三个方面。我们几乎可以用一支粉笔在非洲的地图上画出不同的区域来：占优势的欧洲人地区，真正的非洲人地区，和正在变动的地区。

(费孝通, 1998 :8)

在与政治关系相应的文化学说方面，“文化接触”一方面反对文明的同化 (assimilation)，另一方面也不认为接触只是文化要素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的运动。马林诺夫斯基在其针对同化论和传播论 (diffusionism) 的反击中指出，“接触”发生在彼此不能转化的文化体系之间，它作为一种关系 (合作、对抗、冲击和选择性交往等) 的复合体，必须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就此而论，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1945 :23) 仍然延续了其在研究互惠时的关系性思路，认为“ (文化) 转借 (borrowing) 结束之处，文化变迁才会开始”。

就此而言，马林诺夫斯基所谓的“实践的人类学”就是研究“文化接触带”的人类学。从间战期的世界情势来看，这个想法的出现可谓正当其时，但其在英国本土的接受过程却充满了某种尴尬。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支配英帝国的一直是卢嘉等秉持维多利亚正统帝国观念的政客，而比马林诺夫斯基年轻的一代学人，以格拉克曼 (Max Gluckman) 和埃文斯—普理查德 (Edward E. Evans-Pritchard) 为代表，则不认同他所谓的实践人类学，反而尤其强调从田野中提炼出科学的人类学理论。这背后还有打破伦敦政经学院的垄断，进而推动英国人类学全面学院化的制度趋势 (Mills, 2005)。当费孝通留学归国之际，马林诺夫斯基辉煌的伦敦生涯也进入了尾声。在他因“二战”而离英赴美之际，文化接触学说的局限也已经显现，这种局限恰是本文开篇所说的间战期的国际主义的内在矛盾之一。

(三) 文化国际主义的迷茫 :走出初民之后的道路

1939 年，马林诺夫斯基在《非洲》杂志上撰文评论研究文化接触的“美国路径” (American approach)。此时，“接触”对他而言已经不是欧洲

文化和非洲本地文化的区分问题,而是习俗得以保持活力的唯一途径。至此,他已将习俗的动力与习俗的溯源完全分开 (Malinowski, 1939), 其文化接触观念由此进入更为激进的状态。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1945) 反对溯源,但接受并鼓励对历史的重建 (reconstruction), 不过他认为,只有那些活在文化接触中的传统,也就是那些在面对异质性甚至对抗性的存在时能够活着的传统,才是人们重建过去的起点。

此时,文化接触理论的缺陷开始显现。即使我们如马林诺夫斯基那样,承认文化接触是使文化免于封闭的最重要形式,它也可能更像一种纯粹的发展观念,而这种发展观念究竟会给成长中的新的民族带来什么呢?在马林诺夫斯基离英赴美之前,他的学生、伦敦经济学院教席的继任者弗思 (1991) (Raymond Firth) 出版了《人文类型》(*Human Types*) 一书,书中几乎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马氏功能主义的政治后果的疑虑:这种通过功能主义实现的发展,到底是应该走向殖民地的自决,抑或只是让帝国的统治变得更有效率——例如让社会更紧密团结,公民更守法、更按时纳税,社会公用事业更有效率,等等?弗思的疑问不仅针对自己的老师,同时也是一种对间战期“发展观”的质疑 (Gellner, 1987)。马林诺夫斯基通过文化接触所形成的文化的动力学,最终是否会走向一种更彻底的、去政治化的发展观呢?

20 世纪 30 年代末,随着新的世界大战的开启,民族前景、国家关系以及冲突的问题变得日益迫切,弗思针对发展观的质疑由此引出了更重要的面向: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接触的描述以及他充满现在史意味的习俗概念,能否使共享同一文化的人发展出对文化本身的认同?又能否走向文化自觉性的增长,并将之作为自治 (self-government) 的基础?

在为人类学家弗雷泽所写的悼词中,马林诺夫斯基间接回答了上述疑问。一方面,他仍然认为,只有双轨制而缺乏文化接触的“间接统治”模式不可能真正走向民族自治 (马林诺夫斯基, 1999), 这是其针对“一战”后的世界秩序问题所作出的结论;而另一方面,面对未来的世界和民族,他又希望自治的前景是一种“文化自治”而非武装斗争式的民族主义 (Malinowski, 1941)。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开始,马林诺夫斯基 (1999) 对上述“文化自治”的前景也已不再乐观了。

马林诺夫斯基完全将文化动力集中在了接触,却忽视了接触的机制发生在什么样的政体和文明肌体之中的问题。那么,如果接触并未

促成融合，而是激发了回撤，使得相互接触的文化要素非但没有实现结合，反倒各自撤回到某种更为激进的原生传统，甚至不惜抑制接触本身呢？这正是此后人类学所极为关注的“传统的发明”（霍布斯鲍姆等，2020）问题所带来的冲击。1943年5月，《美国社会学杂志》刊出了马林诺夫斯基在去世前写完的最后一篇文章《泛非洲的文化接触问题》（*The Pan-African Problem of Culture Contact*）。此时，因战争而留在美国的马林诺夫斯基已变得相当焦虑。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开始重视并回归自己的非洲传统，但这种返回在很大程度上是返回到一种由自己人发明的传统社会。在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943）看来，这是一种“旧的部族观”（old tribalism），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种族界限的固化。面对正在各地广泛萌发的关于建设民族的问题，“传统的发明”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更具民族想象力的口号和范式。马林诺夫斯基也承认，“传统的发明”无疑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动力，甚至可能通向所谓“新战国”的格局（王铭铭，2012）。

无论是互惠性还是文化接触，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活着的传统”都带有明显的国际主义色彩。对于这种色彩，马林诺夫斯基研究者一度相信是由他来自中欧的文化与政治传统所致。¹⁵ 不过，如上文所示，马林诺夫斯基的国际主义更多的是来自他对“一战”后世界秩序的感知，而不是他的哈布斯堡背景。马林诺夫斯基的贡献在于，他试图通过批判间接统治所带来的传统社会和因俗而治的理论，将习俗从国家主义的话语当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既不走民族—国家，也不会陷入文明等级论的理论基础。在“二战”已起之际，马林诺夫斯基（2009 :7）对威尔逊式的“国联”的失败感到痛心，但他的对策仍是国际主义的线路，即在失败的国联基础上，建造一个能够立法且有足够的法律执行能力——“可以管理一切需要中央控制体系才能解决的国际礼仪纠纷”——的新国际秩序。

15. 随着学界对马林诺夫斯基早期学术背景的重视，其身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波兰知识人的特点也得到了更多的审视，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当数在他诞辰百年的学术会议中所产生的论文集（Ellen, et al., 1988）。不过，在本文看来，将马氏对殖民世界的独立性看法与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欧的独立进行关联的做法，仍然有些简化。下文所述中国学者在社区研究的文化论上的再创造与上述理解形成了对比，恰恰说明将特定理论的生命仅仅归因于作者的生平处境而缺乏超越情景的感通，对思想史的写作而言是一种限制。

马林诺夫斯基并不区分国家主义和民族建设的问题,这是其功能主义人类学的某种政治归宿。代表马林诺夫斯基最后思考的《自由与文明》一文,是在思想而非社会分析的层面上展现出走出间接统治的远见的。在这种视野下,原本富有洞察力的“活着的传统”之说,也因此充满了迷茫和不协调。下文将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处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学者着手将“活着的传统”这一框架和民族建设的议题重新加以结合,正是“一战”以来中国知识界在世界史观察方面于社会研究领域所进行的一种再创造。

四、边疆、边政和社区研究:走向民族建设的新路

(一) 国际主义之后:国家主义还是国族

上文指出,在马林诺夫斯基自己的学术脉络中,文化接触正是其反对传统溯源、坚持以“现在史”(presentist history)来书写传统的结果之一。从更为宏观的思想史来看,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所针对的,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以来那种以构造传统社会来促进帝国殖民的传统,他也由此成为在思想上走出间接统治的一个坐标。但是,这一走出间接统治轨道的路径并没有随着马林诺夫斯基离开英国而终止。如上文所示,在“一战”后的世界舞台上,和国家主义相对的国际主义以各种形式进行了发育(入江昭,2009;徐国琦,2012),帝国论和反帝国论等不同的倾向在这一时期同样得到了推进。从20世纪30年代的视角来看,间战期的思想和政治变迁,并非以国际主义替代国家主义,而是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文明冲突与调和的局势下,重谈国家的文明使命(汪晖,2015)。

“二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强烈地刺激了人类学,促使其转向对国民性的研究。这似乎是人类学史上最为决绝地走出初民社会并直面现代政治的时刻。1941年,也就是马林诺夫斯基逝世的前一年,部分美国人类学家在哈佛大学召开了一场关于人类学与“二战”服务的会议,会上应用人类学会也宣告成立(Neiburg and Goldman,2005)。该会议的主旨之一,即在于淡化博厄斯的文化相对主义,以削弱其对人类学参与现代政治的种种制约。

颇具戏剧性的是,就在人类学群体以“文化与人格”的名义宣布“返回”国家间政治的同一年(1941年),《美国社会学杂志》刊发了马林诺

夫斯基的《战争的人类学分析》一文。该文核心观点是,我们不能将战争和人类冲突的天性直接联系起来;恰恰相反,“一战”标志着“全面战争”在世界的诞生,它将“以战止战”的原则推入深渊,并推出了“为战而战”的政治形态(Malinowski, 1941)。马林诺夫斯基犀利而沉痛地指出,威尔逊式的国际联盟(Wilsonian League of Nations)诞生于美国,却也首先被美国所背叛。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张力,正是马林诺夫斯基与那些集中于“文化与人格”旗帜下的人类学者之间的分叉点,而战争则是那最后的试金石。

那么,走出初民社会的人类学如果想要返回现代国家,是否必然会在上述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选择中站队?除此之外,走出初民社会的路线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正是在这个关键的分叉点上,重新审视社区研究的文化论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展开才尤为重要。传统上,这一阶段的发展多被视为早期燕京学派(即南迁之前)在抗战时期的延伸,但就上文所勾勒的思想历史来看,燕京学派在抗战期间围绕着边疆和族群接触带所做的工作,包括关于边政之学的工作,并非意味着社区研究从内地转向边疆,而是走出初民社会的人类学重新返回到对国族的探索。

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时的困惑颇能体现这个探索的开始状态。20世纪30年代后期,马林诺夫斯基对欧美之外的知识分子的期待,随着他对文化接触兴趣的增长而与日俱增。¹⁶ 费孝通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于伦敦接触了文化动态论。他在留英生涯中恰好见证了马林诺夫斯基投入非洲观察的第一个十年的成果(费孝通, 1998)。1936年至1937年,也就是费孝通刚到伦敦之际,马林诺夫斯基主持的讨论班的主题是本文引言中所论及的“文化表格”,然而到了下一个学年,从非洲归来的马林诺夫斯基则把主题从“文化表格”换成了“三项法”(three column approach)。“三项”即马林诺夫斯基观察20世纪30年代非洲文化时强调的三个方面:输入的宗主国文化、非洲的本地文化以及位于其间的接触带文化,而“变化动态的主要空间恰恰是第三个地区”,也就是接触带(费孝通, 1998 :11)。

16. 此举和英国的殖民地行政将社会人类学视为行政官必修课的做法几乎同时发生(参见 Matera, 2015)。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殖民地知识分子对人类学的信心,而不是英帝国总督和殖民行政机构与人类学的合作,才是扩展人类学参与政治的基础。

令费孝通(1998 :7)不解的是,马林诺夫斯基“至少有十三年”的时间去消化他在太平洋民族志调查中获得资料,与之相比,他在非洲的田野经历则难以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田野工作,甚至其中有些部分只能算作“掠影”,然而为何他据此提出的动态论(核心是文化接触)竟会如此重要?对此,费孝通的直觉是,文化接触本质上是对殖民帝国历史的检讨,而不是从形式上理解文化如何接触与变迁的问题。因此,要想理解文化动态或文化接触,核心就在于理解文化动态中所包含的帝国统治问题。¹⁷在费孝通(1998)眼中,文化动态论乃至马林诺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末发起的“实践人类学”,都带有一种对殖民帝国(特别是英帝国)的反思和批评,其反思力度甚至可以说已达到了“二战”前宗主国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

但是,对帝国的反思并不是文化动态论的结局。费孝通在求学期间没有机会完全解开这个疑惑,但他敏感地意识到,文化动态论是一种中间状态而不是定型状态。当人类学走出初民社会之后,其民族志想象力会把动态中的文化引向何种文化的自我意识?马林诺夫斯基在离开英国后的确流露了一些线索。在抵达美国后,马林诺夫斯基于《论文化接触的美国路径》一文的开头所列举的那些将人类学用于社区研究的典型研究,恰好也是其终身的对手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燕京大学讲课时所推荐的作品,即从林德夫妇的《中镇》(Middletown)到槐南(Lloyd Warner)尚未完成的“洋基城”(Yankee City)系列研究,但排除了经典芝加哥学派的社区民族志。这些作品也是吴文藻(2010b, 2010c)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准备在社区研究中推广的作品。¹⁸这三个人的重合选择背后都包含了一个关键的考量,那便是如何通过建构文化论,将功能主义的人类学转向为富有文化紧迫感的社区研究。¹⁹

17. 费孝通在1962年出版的《留英记》中,将功能主义人类学和“间接统治”的密切联系视为马林诺夫斯基学派在英国人类学中地位上升的原因之一。

18. 在费孝通(2007)看来,20世纪30年代,对于社区研究的形成而言,最重要的路径是人类学,这间接证明了吴文藻与人文区位学理念之间的距离。

19. 1942年3月,在接替吴文藻主持工作的费孝通的带领下,燕大一云大社会学工作站的社会研究者在昆明召开了讨论会。由费孝通主笔的总结性报告《战时社会学研究报告》(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War-Time China)特别以“活着的过去”(living past)来总结社区研究的时间观。这一说法与吴文藻的“不灭的文化”以及本文前述的“活着的传统”,在内涵上是一致的。

(二) 带有文明紧迫感的社区研究 :燕京学派的边疆和边政学说

这种文化上的紧迫感,在社区研究中同时兼有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的表达。早期燕京学派的工作,在理论上表现为建立社区之间的关联性,而不是去探讨小社区如何代表大社会的问题(王利平,田耕,2026)。吴文藻在20世纪30年代便非常清楚,中国社区研究应当在中国这一大的社会系统而非在“微观社区如何代表中国社会”的层次上看待社区。因此,他在《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与功用》一文中首先指出,部落、乡村和都市这三种社区类型,才是以社区研究来考察现代社会的立足点(吴文藻,2010e)。这里的社区已经是文化类型的代表,而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国这个整体而言异常关键。

文化紧迫性在经验分析中的落实,则体现在社区研究者在抗战期间关于边疆的一系列研究上。吴文藻(2010j)在《边政学发凡》一文中明确地将“边政”和“乡政”并举视作描述文化类型的一种尝试。该文高度肯定传统中国的“王道文化精神”,并强调,文教与涵化在“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之后会更有利于创建多民族国家(吴文藻,2010j:570、580)。吴文藻(2010j)甚至期待,能够以此为基础找到关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新理论纲领。²⁰事实上,吴文藻所谓的“王道精神”,与他在1938年评介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表格》时所谓的“中华文明”有相当一致的地方。²¹可以说,社区研究的文化论,正是以边疆和边界为枢纽,才得以将走出初民社会的人类学真正转向对于文化国族的描述。

《边政学发凡》进一步扩展了吴文藻在《民族与国家》一文(载于《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3号)中的思路。他在这篇完成较早的文章中表示,“一战”所带来的民族主义运动乃是“民族建国”思想的产物,这一思想脉络从勒南(Ernest Renan)一直延续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吴文

20. 吴文藻(2010j)此处所用的“王道”一说转借自孙中山,意指造成民族的“自然力”。他指出,在孙中山那里,与造就“国家”的武力相对,自然力造成民族者有五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比较之下,武力在造就国家、领土、人民和主权三方面最为重要(吴文藻,2010a)。

21. 中华文明“逐渐的生长,逐渐的把领土扩大,使境内境外许多文化比较落后的初民异族,逐一同化,最后把它们纳入广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合体中,所以邻邦被我们潜移默化,即使是征服我们的异族也被同化于中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中”(吴文藻,2010h:294)。

藻,2010a)。不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只是偶发现象而非一般情况。只要多民族之间能够形成更具密度和强度的共同生活,就能整合成为一个国家民族。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将边政研究的重心从关心土地推广转移到建设更具密度和强度的文化生活上来。²²

这一边政学理念,意味着将文化边界有序地安置在民族的机体之中。对于社区研究而言,就是要把对文化边界的描述恰当地放在社区的机理当中。社区研究的文化论正是对上述理念在理论层面和民族志意义上的进一步发挥。在理论层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李安宅对边疆社会工作的阐释。《边政学发凡》发表两年之后,已经在拉卜楞寺完成精彩的藏地民族志的李安宅,又出版了《边疆社会工作》这本文集,其中的《何谓边疆》和《边民社区实地研究纲要》两文都是对《边政学发凡》的精彩延伸,同时也是将社区研究思路向边政领域延伸的体现。

在李安宅(2012:23-24)笔下,“边疆社会工作”就是“边政”,也就是对“边疆的经略之法”的转化。这个转化的核心包含经济的区域分工和精神的区域分工(公民建设)两方面,可谓“利用原有的地形而超乎原有的限制”(李安宅,2012:10-11)。在《边民社区实地研究纲要》中,李安宅(2012:95-99)将他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转借的“文化适应力”概念演绎成了四个层级:“人适应于自然者”(厚生)、“人适应于同类者”(群居之道)、“人对自己身心的适应”(人格)和“人对超自然(不可知)的适应”(宗教)。这一演绎意味着文化适应从个体走向了民族建设,继而使形成一个强健的政治文明道路的目标更加清晰。这也是战时燕京学派社区研究的一种共同志向。²³这四个层面的文化适应的总结果,其实正是吴文藻在《边政公论》中所谓的造成整体生活之丰富浓郁的整合力。

如果说边政思想代表了社区研究走向新的民族建设的精神期许,那么这一期许又如何体现在其分析旨趣当中呢?在微观层面,抗战之前的燕京学派不仅长于对社区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的描述,同时还

22. 徐益棠(1942:54)在回顾20世纪30年代民族学的进展时也指出了类似的矛盾:学界所重视的民族学其实是韦斯特·马克等人的进化人类学,而边政关心的则是“土地”与“主权”两端,对“边地民众之如何认识,如何开化,如何组织与训练”等问题则关注较少。

23. 其中,在作为群居之道的适应中,李安宅(2012:95-99)进一步区分了民风(“群众的习惯”)、民仪(“民风中视为关乎群众的福利而应加以舆论上的拥护者”)和制度(“民仪中加以规章之制定或组织之维持者”)三者,至于改造少数人的旧传统,则被其归为“革命”等更为细致的类别。

重视围绕边界和裂隙所产生的跨界行为,对沿着可见的社区边界的文化动力的观察尤其敏锐。战时,社区研究的经验写作手法也愈发丰富。例如,1943年初,比费孝通小一岁的蒋旨昂(1943)在川西地区沙漏至马塘一带的黑水区域完成的社区报告,便是以社区研究考察人群边界的一个典型。²⁴

蒋旨昂的报告是对家舍的微观民族志,其重点在于探索其中不同社会关系的交缠。其中,族群接触(ethnic contact)仅作为背景出现,而在比蒋旨昂小一岁、同样出身于燕京社会学的李有义那里,写作族群接触的手法则更加鲜明。1939年秋,比蒋旨昂更早抵达西南后方的李有义在昆明路南县尾村进行调查,路南县尾村“汉夷杂处”的聚落形态引起了他的兴趣。从形式上看,汉和夷在李有义报告中几乎只有“族群”和“家户”两种形态,而没有具体的个人。与同一时期如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等云南社区研究相比,李有义的报告中缺少对研究对象的微观描摹,这与其将社区关系作为社区民族志之基础的写法有关。

李有义的写作始终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由地权逆转所引发的经济分化对文化接触形态的作用。地权转化促使汉人离村并成为不在村地主,同时也造成绝大多数夷民在营生上离不开土地,继而走向农业化。在李有义笔下,农业和农作是夷民生态位的基础,深描农业实则就是深描那些生活在尾村且在同治时期获得历史新生的夷民。

有意思的是,在“魁阁”这一学术团体的其他成员所写的村落社区研究中,环境、地理和自然描写往往被置于篇首,但在李有义报告中,这些内容则被放在了第五章,成为“农业”中相当短促的一部分,而真正开启并框定全文的,则是以口传历史为基础的汉夷接触自然史。该书前四章密集地呈现了两个族群因经济分化而形成的营生分化,因此,“耕作与否”而非“地主和佃户”的区别才成为那条更深刻的人群界线。第五章到第十章占全书篇幅的六成,其中除第七章“赶街子和信用”中混合着对汉民和夷民的描写之外,其余各章均以夷民的生活为重心。第九章“婚姻与家庭”是报告中最接近于对夷民进行风俗观察的部分,其中结合了对婚丧制度的叙述和对仪式现场特别是礼物部分的即时观察。整

24. 对于蒋旨昂这一报告如何从边界出发来描述社区的文化构成的分析,可参见田耕(2023)的论述。蒋旨昂对黑水社区的核心——衙门作为政教中介的描述,与当代历史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切的共鸣(郑少雄,2016)。

体来看,该书的前五章以平静的笔触呈现了一个从虚实同在的自然史向由经济分化所导致的社区史的转型。

与蒋旨昂的社区研究相似,李有义文中最富特色的部分并不是风俗和民情,而是内在于社区的边界和秩序。例如,尽管对于集市的描写向来是燕京学派社区研究所所长(傅春晖,2021),但李有义对尾村农民“赶街”所进行的第一个观察却不是针对市镇本身的地理或生态位,而是不同村民的赶集频率。他按频率对社区内的村民进行了划分,将之分为从“每三日一赶街”到“每半年一赶街”五类。针对赶街最频繁的18户人家(每三天一次),其中包括7户汉人和11户夷人,李有义进行了专门的考察,结果发现,频繁赶集的汉人多是商贩,而夷人却分化为两端:极富的3家夷民将赶集作为生意,其“交易额比上述的几家汉人都大”;至于其他8家,则都是田地很少或无田的农民,他们在赶集中没有从事生意,而只是卖烧柴以补贴家用。

社区的秩序与稳定的内在阶层划分互为表里。李有义的报告一方面并未将接触和混合所带来的风俗混同和变异作为兴趣点,另一方面也较少呈现行动者之间的直接互动模式,汉民和夷民对彼此的直接评论和看法更是少见。“杂区”中的接触实际上是通过物质和制度的逐次分化来加以折射的,无论是在第七章“赶街子和信用”中,还是在第八章“生活水平”中,李有义最为关注的始终都是汉和夷各自内部的分化。而他按照食物消耗、衣着、房屋占有数量进行的分类,也表明其选择“经济”作为分析的入手点正体现了其对群体中阶层划分的兴趣。这种写法与那些专注于身份边界(identity boundary)的民族志传统形成了有趣的对比,²⁵同时恰恰与上文所述马林诺夫斯基在1939年所提到的槐南主持的洋基城社区研究高度呼应。²⁶

如吴文藻所述,社区的历史是环境、人和文化三者交织而成的历史。围绕社区边界发展出来的分析手法,进一步促使社区研究形成了关于文化变迁的宏观视野。1941年留美归来、重回燕大的林耀华,将生态和人群聚落视作划分复杂西南边疆的基本着眼点,他认为,西南诸省之

25. 一个典型的概念是人类学家巴特(2014:7-11)在《族群的边界》“导言”中所提到的“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ies)之说。关于共享同一生态条件的人群何以认同迥异的研究,可参见:Cole and Wolf,1999。

26. 对槐南的洋基城研究中如何处理不同阶层接触的手法,可参见:赵后琛、田耕,2026。

间的交界地带是从社区研究视角理解边疆社会的关键。林耀华于1945年发表的关于川康交界嘉戎地区的民族志,也很强烈地渗透了这个思路,其《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一书的开篇便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川康北部交界区域,以地势论,乃系康藏高原的极东地带。这地带北有岷山,南有邛崃山脉,彼此纵横交错,低地则河流交织,间成平坝河谷。……从文化上而论,东部中原文化的汉族早已占据盆地,立下根基。西部藏族文化亦渐于拉萨中心,向四邻扩展。历代民族斗争,人口迁徙,弱小的部落遂被驱至川康北界。……这些弱小的部落,大别有羌民、嘉戎、西番各族,迄今仍是相互杂处,彼此为邻,形成川康间的特殊边区。……大约言之,在川康北境之内,羌民居于东,嘉戎居于西,西番居于北,三族形成地域上的三角关系。(林耀华,2009)²⁷

林耀华以滇东为中点区分的三个亚区,与比他早约十年进入西南考察的陶云逵(2012)的划分相去不远。²⁸这种对于文明亚区交界带的形成和发展动力的阐发,是中国社会学史考察中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王明珂,2008;王铭铭,2015)。如果说“边政”在形式上是民族建设的方略和中国社会研究的各个学科相结合,那么上文则表明,社区研究通过诸如“文化适应”概念的多层次扩展,已将“边政”的精神期许落实到了从个体到生态的各个层面之上。更重要的是,就分析手法而言,上文已表明,社区研究从社区之间的关系中推演出了生态分界,创造性地发展了文化接触的学说。因此,从微观到宏观,社区研究的文化论逐次递进地将民族的文化机体表达了出来。吴文藻所谓的“乡政”和“边政”的并举,并非一种简单的比拟,而是研究工作的实态。

27. 《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第一小节“嘉戎社区与民族”的前5段,与林耀华(1947: 33-43)另一篇文章《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的第一小节“川康北界的区域状况”,在写法上一致,都是对这一区域如何成为“羌、嘉戎和西番”聚落状态的历史和地理述要。林耀华从生态和族群边界两个维度对川康北界进行区分的方式,在此后的历史人类学中仍有回响,典型的做法可见于王明珂(2006)。

28. 不过,以滇东作为西南民族生态中点的做法,林耀华在实际着手进行西南地区民族志调查之前便已形成,这最早可追溯至其攻读博士期间依据文献所获得的认识。在1943年3月刊发的《边疆研究的途径》一文中,林耀华(2023a: 59)指出:“汉民以外西南三大族群(即文中所说的苗瑶群、泰或掸群和藏缅群)经过了许久的历史沿革,彼此之间难免交相侵入杂居共处,但现在的地理上的分布情形,尚可大体划分出来。若以滇东为中点,中点以东为苗瑶群,以南为泰或掸群,以西或西北则为藏缅群”。

五、总结和余论

在早期中国社会学中,吴文藻对社区研究的文化论进行了基于西学理论的综合,而他这种带着强烈主体意识的新综合到底从何而来,又走向何处?本文即从这个问题出发,将吴文藻所代表的中国学者对“一战”后世界秩序的观察,与马林诺夫斯基对“一战”后的世界秩序的感知并置,由此发现了双方的第一个共同点——一种走出初民社会和直面文明变迁问题的人类学。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说与社区研究中都有很强的文化论基调,此基调的根源在于如何走出初民社会这一思想史主题。

然而,走出初民社会的通感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学术道路。马林诺夫斯基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之间打造了一种兼具现在史和关系性视野的文化接触概念。该概念一方面继承了他此前在太平洋民族志中以互惠性来洞穿初民和文明两分的做法,另一方面则特别针对“间接统治”下的非洲而发。在欧洲殖民社区与被特地保存的本地文化之间,马林诺夫斯基将“接触”视为自成一体的文化生成机制,并主张文化的接触带才是保有文化变迁活力的关键。这种主张延续了他一直以来拒绝传统溯源的做法。最终,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马林诺夫斯基走出初民社会的理论动机与一种悬置国家、抑制文明和野蛮之分的国际(联盟)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随着“二战”的爆发,全面战争形态已不可避免。以上述国际主义为底色的文化接触学说的困境日益明显。马林诺夫斯基下一辈的英国人类学家愈发不认可他的“实践人类学”。以“文化和人格”学说为代表的美国人类学则在走出初民社会之后,更加强调国家性,而非马林诺夫斯基所执着的国际主义。“一战”后,中国知识分子亦在关心世界史变动的同时,很早开始了对国际主义的反思和批评。正是由于上述思想背景,中国社区研究在发展自身文化论时才有了不同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动力和契机。

简言之,社区研究的文化论在走出初民社会的同时,开拓了一条重返文化国族的社会学道路。上文因此指出,在抗战期间,燕京学派所代表的社区研究并非将社区的空间从内地转移到边疆,而是以边政和边疆为枢纽,来继续推动走出初民社会的人类学。在这个兼具精神和政治双重意涵的构想当中,社区和边政的呼应,即吴文藻所谓的“乡政和边

政”的并举,衍生出了对于文化边界之动力的分析。这种分析手法不仅在宏观上催生了对中国文化亚区关系的论述,还在微观上激励了对人群交界地带文化构成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的分析,都将民族建设视为社区的一个自然延伸。社区研究的文化论进一步强化了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而这正是吴文藻所谓“王道精神”的一个方面。

在本文简略勾勒的这段思想的交叠和共鸣中,社区研究的文化论不仅正在向边疆延伸,事实上还成就了一段关于功能论与社区民族志的跨国史。这段旅程的起点是改变世界的“一战”,终点则是一个以社区研究的文化论来建设民族的新方案。此时,吴文藻、李安宅和费孝通等早期中国社会研究者,通过对功能论的反思,提供了形塑文化国族的关键思路。马林诺夫斯基那种强调习俗应与传统社会分离的功能论被中国学人以强有力的方式转化为一种社会改造的可能进路,由此释放了其本人并未完全预想到的思想力量。

在方法上,相较于此前那种围绕确定的学术中介来写作的思想继受与观念传播,本文更强调以对共处世界的“通感”为前提的学术史,这种“通感”更强调同时代学者之间的相互启发,聚焦于针对同一个世界秩序的想象如何催生出学术观念的并行与分歧,而非鉴别移植、借用或误用。正是在这种视野下,马林诺夫斯基对那种以构造“传统社会”为基础的“间接统治”的批评,潜在地释放了社区研究的文化论的某种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正是上文所述的走向民族建设的社会学之路所体现的。

社区研究的文化论在民族建设中走出了独立的形态,但这并非其学术道路的终点。自抗战时代起,在国际主义与民族建设之外,关于文化自觉心的讨论便不绝于缕(周飞舟,2017;张浩,2025)。至于社区研究的文化论如何在融贯民族文化机体之后,成为一种超出文化类型说的“自觉心”,则有待后续另文加以分析。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巴特,弗雷德里克.2014.族群与边界[M].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布尔,赫德利·亚当·沃森.2014.国际社会的扩展[M].周桂银、储召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费孝通.1998.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 :5-18.

- 费孝通.2010.江村经济[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弗思,雷蒙德.1991.人文类型[M].费孝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傅春晖.2021.早期燕京社会学的人文区位学研究——以杨庆堃的《邹平市集之研究》为例[J].社会学评论(5):193-213.
- 盖塔彻,奥朵姆.2025.革命之风:殖民地大撤退与非洲的独立之路:1945—1975[M].生安锋、周英莉,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高晋元.1989.论英国在非洲的“间接统治”[J].西亚非洲(3):21-30.
- 侯俊丹.2018.市场、乡镇与区域:早期燕京学派的现代中国想象——反思清河调查与清河试验(1928—1937)[J].社会学研究(3):193-215.
- 黄文山.1943.综论殖民地制度及其战后废止的方案[J].民族学研究集刊(5):1-25.
- 霍布斯鲍姆,埃里克·特伦斯·兰杰.2020.传统的发明[M].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蒋廷黻.1933.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与国际[J].独立评论(45):1-4.
- 蒋旨昂.1943.黑水社区政治[J].边政公论2(11·12):21-29.
- 金兹伯格,卡洛.2014.孤岛不孤:世界事业中的英国文学四论[M].文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安宅.1935.致 Selskar M.Gunn 信函(11月26日)[Z].李安宅档案(档案号:340-5195-1060/1061).纽黑文:耶鲁大学.
- 李安宅.2012.边疆社会工作[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李大钊.2014.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G]//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大钊卷.杨琥,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章鹏.2008.社会调查与社会学中国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的考察[G]//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黄兴涛、夏明方,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梁启超.2014.欧洲心影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
- 梁永佳.2020.贵货不积:以《老子》解读库拉[J].社会学研究(3):71-93.
- 林耀华.1947.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J].边政公论6(2):33-43.
- 林耀华.2009.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G]//燕京大学学术期刊汇编:社会学卷(第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林耀华.2023a.边疆研究的途径[G]//林耀华全集(第一卷).庄孔韶,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林耀华.2023b.英美人类学知识应用于行政领域的借鉴[G]//林耀华全集(第一卷).庄孔韶,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刘咸.1935.国防建设与边疆民族[J].东方杂志(9):35-43.
- 刘增贵.2002.中国礼俗史研究的一些问题[G]//法制与礼俗: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陆远.2019.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文浩.2008.重申民国社会学史上的社会调查派[G]//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黄兴涛、夏明方,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马建标.2018.“受难时刻”: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裁决与威尔逊的认同危机[J].近代史研究(3):23-38.
- 马林诺夫斯基,布罗尼斯拉夫.1999.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人生史的评价[G]//科学的文化理论.黄建波,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马林诺夫斯基,布罗尼斯拉夫.2009.自由与文明[M].张帆,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马林诺夫斯基,布罗尼斯拉夫.2010.序[G]//江村经济.费孝通.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马林诺夫斯基,布罗尼斯拉夫.2017.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弓秀英,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

马长寿.2003.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G]//马长寿民族学论集.周伟洲,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梅佐尔,马克.2015.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M].胡晓姣、秦雅云、唐萌,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莫斯,马塞尔.2002.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入江昭.2009.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M].刘青,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萨义德,爱德华.2023.旅行的理论[G]//萨义德精读本:1966—2006.穆斯塔法·巴尤米、安德鲁·鲁宾,编.叶安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施华辉.2022.约翰·西利、爱德华·弗里曼的古今比较及其帝国观念[J].世界历史(1):11—27.

陶云逵.2012.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G]//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田耕.2019.中国社会研究史中的西南边疆调查:1928—1947[J].学海(2):21—33.

田耕.2020.民族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从“弗莱堡演讲”到“经济与社会”的两条思路[J].社会40(6):1—30.

田耕.2023.交错继承的学术传统:以抗战期间的一些边疆研究为例[J].学海(2):103—115.

汪晖.2015.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王利平、田耕.2026.发现社区与重看乡土:芝加哥学派和燕京学派的比较[J].中国社会科学(3):100—119.

王明珂.2006.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明珂.2008.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铭铭.2005.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铭铭.2012.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王铭铭.2015.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王铭铭.2021.从东南到西南:人文区位学随笔[M].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文藻.1985.吴文藻自传[G]//中国现代社会学家传略(第六辑).晋阳学刊编辑部,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吴文藻.2010a.民族与国家[G]//论社会学中国化.陈恕、王庆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文藻.2010b.现代法国社会学[G]//论社会学中国化.陈恕、王庆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文藻.2010c.《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导言[G]//论社会学中国化.陈恕、王庆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文藻.2010d.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G]//论社会学中国化.陈恕、王庆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文藻.2010e.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与功用[G]//论社会学中国化.陈恕、王庆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文藻.2010f.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G]//论社会学中国化.陈恕、王庆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文藻.2010g.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G]//论社会学中国化.陈恕、王庆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文藻.2010h.论文化表格[G]//论社会学中国化.陈恕、王庆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文藻.2010i.《社会学丛刊》发刊词[G]//陈恕、王庆仁,编.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文藻.2010j.边政学发凡[G]//论社会学中国化.陈恕、王庆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肖文明.2024.文化、心理与社会:试论孙本文的文化观[J].学术月刊(7):119—129.

- 熊莹.2011.“罗马类比”与维多利亚—爱德华时期英国“帝国话语”的建构[G]//英国研究(第3辑).陈晓律,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徐国琦.2012.“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J].文史哲(5):5-15.
- 徐益棠.1942.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边政公论1(5·6):54-66.
- 杨度.1986.金铁主义说[G]//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杨清媚.2010.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张浩.2025.从“民族自觉”到“文化自觉”——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探源[J].文史哲(2):113-125.
- 赵启琛,田耕.2026.小城镇与社区研究——以槐南和二战前后芝加哥学派社区研究为例[J].社会学评论(3):70-92.
- 郑少雄.2016.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周策纵.2019.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M].陈永明,张静,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周飞舟.2017.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J].社会37(4):143-187.
- 周鯨生.1922.万国联盟与委托治理[J].太平洋(8):1-8.
- 周鯨生.1930.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G]//国际政治概论.上海:神州国光社.
- Abrahams, Ray. 1991. “Ancient Law and Modern Field Work.” In *The Victorian Achievement of Sir Henry Maine: A Centennial Reappraisal*, edited by Alan Diamond.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5-192.
- Bashkow, Ira. 1995. “The Stakes for Which We Play Are Too High to Allow of Experiment: Colonial Administrators of Papua on Their Anthropological Training by Radcliffe-Brown.”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22 (2): 3-14.
- Brown, Judith M. and Wm. Roger Louis. 1999.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IV: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e, John and Eric Wolf. 1999. *The Hidden Frontier Ecology and Ethnicity in an Alpine Valle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leman, Leo. 2021. “Malinowski and Mauss Exchanging Knowledge in Interwar Europe: Lessons in Internationalism”. *Durkheimian Studies* 25 (1): 78-106.
- Cooper, Frederick. 2004.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Era of Decolonization: The Examples of British and French Africa.”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0 (1): 39-38.
- Ellen, Roy, Ernest Gellner, Grazyna Kubica, and Janusz Mucha. 1988. *Malinowski Between Two Worlds: The Polish Roots of An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ks, Freddy. 2018. “Bronislaw Malinowski, ‘Indirect Rule,’ and the Colonial Politics of Functionalism Anthropology, ca. 1925-1940.”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60 (1): 35-57.
- Ford, Lisa. 2010. *Settler Sovereignty: Jurisdiction and Indigenous People in America and Australia, 1788-183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ellner, Ernest. 1987.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Bronislaw Malinowski.” *Current Anthropology* 28 (4): 557-559.
- Gorman, Daniel. 2012. *The Emergenc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 192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nn, Christopher H. 1992. "Radical Functionalism :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7 (2) :141-166.
- Held, G. Jan. 1953. "Applied Anthropology in Government : The Netherlands." In *Anthropology Today : An Encyclopedic Inventory*, edited by Alfred L. Kroeber.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66-879.
- Humphreys, Sarah C. 1969. "History, Economics, and Anthropology : The Work of Karl Polanyi." *History and Theory* 8 (2) :165-212.
- Hyam, Ronald. 2010. "Bureaucracy and Trusteeship in the Colonial Empire." In *Understanding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nyatta, Jomo. 1982. *Facing Mount Kenya : The Tribal Life of the Gikuyu*. Nairobi :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 Kohl, Karl-Heinz. 2013. "Ethnology and the Ambiguity of German Colonialism." *Divinatio* 36 : 25-39.
- Kuklick, Henrika. 2011. "Personal Equations :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Fieldwork,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 *Isis* 102 (1) :1-33.
- Rosa, Frederico Delgado and Han F. Vermeulen. 2022. *Ethnographers Before Malinowski : Pioneers of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1870-1922*. New York : Berghahn Books.
- Lebovics, Herman. 1992. *True France : The Wars over Cultural Identity, 1900-1945*.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ugard, Frederick D. 1922.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Scotland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 Mair, Lucy P. 1933.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s a Sci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 32 (129) : 366-371.
- Mallard, Grégoire. 2019. *Gift Exchange :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a Political Idea*.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29. "Practical Anthropology." *Africa :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2 (1) :22-38.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30. "The Rationaliz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Administration." *Africa :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3 (4) : 405-430.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39. "The Present State of Studies in Culture Contact : Some Comments on an American Approach." *Africa :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12 (1) :27-48.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41.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6 (4) :521-550 .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43. "The Pan-African Problem of Culture Contac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8 (6) :649-665.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45. *Dynamics of Cultural Change : 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 in Africa*. Edited by Phyllis M. Kaberry.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amdani, Mahmood. 1996. *Citizen and Subject :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ntena, Karuna. 2010. *Alibis of Empire : Henry Maine and the Ends of Liberal Imperialism*.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tera, Marc. 2015. *Black London : The Imperial Metropolis and Decolo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akland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tthews, Zacharia. K. 1937. "An African View of Indirect Rule in Africa." *Journal of 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 36 (145) :433-437.
- Mills, David. 2005. "Anthropology at the End of Empire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lonial

-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1944–1962.” In *Empires, Nations, and Natives : Anthropology and State-Making*, edited by Benoît de L’Estoile, Federico Neiburg, and Lygia Maria Sigaud. Durham :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Sally Falk. 1992. “Treating Law as Knowledge : Telling Colonial Officers What to Say to Africans about Running ‘Their Own’ Native Courts.” *Law & Society Review* 26 (1) :11–46.
- Moyn, Samuel. 2010. *The Last Utopia :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eiburg, Federico and Marcio Goldman. 2005. “From Nation to Empire :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Empires, Nations, and Natives : Anthropology and State-Making*, edited by Benoît de L’Estoile, Federico Neiburg, and Lygia Maria Sigaud. Durham :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agden, Anthony. 1995. *Lords of all the World : Ideologies of Empire in Spain, Britain and France c.1500–c.1800*.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ederson, Susan. 2005. “Settler Colonialism at the Bar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Settler Coloni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Projects, Practices, Legacies*, edited by Caroline Elkins and Susan Pedersen. New York : Routledge.
- Pederson, Susan. 2006. “The Meaning of the Mandates System : An Argument.”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2 (4) :560–582.
- Pels, Peter. 2011. “Global ‘Experts’ and ‘African’ Minds : Tanganyika Anthropology as Public and Secret Service, 1925–1961.”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7 (4) : 788–810.
- Perham, Margery F. 1956. *Lugard : The Years of Authority 1898–1945*. London : Collins.
- Powdermaker, Hortense. 1967. *Stranger and Friend : The Way of an Anthropologist*. New York : W.W. Norton & Company.
- Schmidt, Hans. 1998. “Democracy for China :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Diplomatic History* 22 (1) :1–28.
- Steinmetz, George. 2007. *The Devil’s Handwriting : Precoloniality and the German Colonial State in Qingdao, Samoa, and Southwest Africa*.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einmetz, George. 2008. “The Colonial State as a Social Field : Ethnographic Capital and Native Policy in the German Overseas Empire before 1914.”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 (4) :589–612.
- Tuori, Kaius. 2014. *Lawyers and Savages : Ancient History and Legal Realism in the Making of Legal Anthropology*. London : Routledge.
- Wheatley, Natasha. 2013. “The Compass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 Eric Hobsbawm and After.”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1 (4) :424–432.

责任编辑 :郭 琦